

借物寓意

— 论宋亭台记的文体特征及文化意蕴 —

朴云锡* · 赵 燕**

“记”原为应用性的记事之文，作为短篇散文的“记”体散文，是在唐代韩、柳开创的“古文”新体的基础上形成的。文人或借“记”以议论时事，或抒发个人感慨，突破了简单的“叙事识物”的记事范围，并以单行奇句而兼取骈语的散文语体代替骈文语体，发展出具有文学性的短篇成体散文。亭台记是“记”体散文中最具代表性的题式之一，篇目众多，且成就显著。

宋初亭台记仍延续着唐人的三段论模式，余靖、尹洙之后，始发生变化，感情诚挚自然，体式多样，表现内容由仕宦休闲扩展到文人读书休憩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表达手法虽不脱议论、写景、叙事等，但文体意识已有所转变，转为以论为记，并发展出借物寓意之新体。本文拟从宋亭台记的文体生成与发展角度入手，探求其体制变革及内在原由，并展现与之相关的文人文化生活。

I

宋亭台记除记传统的官署亭台以外，出现了大量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斋堂记，这时的官署亭台记在表现内容上也有异于唐，最显著特征是入题正大，在亭台记中发抒经世之志，这在古文大家的记文中体现得尤为明

* 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教授

** 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招聘教授

显。

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通常记文中的亭台宴游之乐，上升到家天下的高度，成为千古传颂的警句。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记“饮滁水而甘，因为建亭”，“本是韵事，却说得题目如此正大。”¹⁾ 虞集在评《喜雨亭记》时也说：“此篇题小而语大，议论干涉国政民生大体，无一点尘俗气，自非具眼者未易知也。”²⁾ 可见，在小题目中，杂入经史之论，是宋亭台记的普遍写法，也是有别于唐人的重要特征。《御选唐宋文醇》在《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中论及欧阳修《丰乐亭记》时说：“俯仰百年间，想创业之艰难，识治平之有由，抚安乐之适时，惧危亡之不戒，期全孝于抒忠，畏失义而离道，种种具流露于意言之表。”³⁾ 正因有如此胸襟，故而能将宴游之亭，与乐“岁物之丰成”相联系，且从宋平定天下，海内宴清入手来说明“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正如《古文观止》所评：“作记游文，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阔大。其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又增无数烟波。较之柳州诸记，是为过之。”⁴⁾

宋亭台记另一显著特征是斋堂记增多。宋人多在官署或住宅内辟屋宇以供日常休栖，如穆修在《静胜亭记》中描述他的日常生活时说：“惟比旦一过厅还，则拥书自娱，常言吾职甚逸，吾性加疏，思得洒然空旷一字为寄适之地，尽糞除耳目俗哗而休吾心焉。”⁵⁾ 辟一字以供澄怀味象，这在欧阳修的《非非堂记》中也有相似的表述：“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营其西偏作堂，户北向，植丛竹，辟户于其南，纳日月之光。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⁶⁾ 王禹偁更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以山野之人的形象表现公退之

1) 洪本健. 欧阳修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2004. p.775.

2) 转引自王水照选注. 苏轼选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p.349.

3)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五.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吴楚材、吴调侯. 古文观止.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p.333.

5) 曾枣庄, 刘琳主编. 全宋文：卷三二三. 成都：巴蜀书社 1988年版. p.432.

6) 全宋文：卷七四一. p.128.

暇的幽怀雅致：“公退之暇，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销遣世虑。”⁷⁾ 这类供文人休憩的亭堂多建于园宅幽静处，其中陈列大致为“几案琴酒，轩窗图书”。文人于公事之余，朝夕居于其中，或读书抚琴，或焚香默坐。其功能与书房相类，因有休心静虑的要求，故又以斋命名。胡宿在《高斋记》中解释说：“夫斋，戒洁之，称休舍之所。”⁸⁾ 欧阳修在《东斋记》中也说：“官署之东有阁以燕休，或曰斋，谓夫闲居平心以养思虑，若于此而斋戒也。”⁹⁾ 可见文人将此类斋堂作为个人铸魂养魄的清修之地。

为这类斋堂所做的记文多书于壁间，按内容及作文意图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警戒性质的记文，类于箴铭，刻于堂壁以自儆。或围绕政事，如张竑作《思亭记》，曾巩作《思政堂记》，为约束心性，以防逸豫放乐，此处所云“思”，实指内心的警醒。尹洙《志古堂记》，韩琦《定州阅古堂记》，则以为求古之道而后才能立身处事，主张在燕处之间，监古以自勉。或关乎心性修养。因斋堂为休心之所，记文中议论常围绕清静之理，如张舜民《静胜斋记》：“天下之事非一，不静则不能胜也。”¹⁰⁾ 范钺《静轩记》：“大抵人性无不静，有时而动者，物挠之也，物挠之则不得其静矣。故吾之为静者，将以御夫动也。然天下之物吾不能以一己而胜之，苟外物足以撓吾心，吾能以虚而待之矣，至于死生得失为累之大者，又奚能自必哉？”¹¹⁾ 心静才能照物，才能制动，故休心以虚静为要。老庄思想以养心，孔孟之道则养志，苏舜钦以浩然名堂，吴子野命之以岁寒，郑侠在为其作记时说：“岁寒，然后知松柏。而世之言坚久者，皆指是以为喻。先生正固悠久之人也，故其守己者，一而不杂；其与人者，久而不变。”¹²⁾ 揭示

7) 全宋文：卷一五三。p.474.

8) 全宋文：卷四六六。p.539.

9) 全宋文：卷七四一。p.131.

10) 全宋文：卷一八零六。p.731.

11) 全宋文：卷一八三一。p.154.

12) 全宋文：卷二一七七。p.372.

其名堂之义。

二是借斋堂记以自表生平志意、处世原则及其选择的生活方式。陈尧佐因其耿介孤傲，不为众人所知，后因言事贬通判潮州，作《独游亭记》书于屋壁，声言不与人交接是性分之所近，而非因谪官伤神独善其身，进一步辩白其“道不可苟合，颜不可妄悦”。欧阳修在《非非堂记》中的“非非”为“夫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之义，亦为辩白其志。上述记文尚借阐亭台之义抒怀明志，曾巩的《南轩记》就完全成了自述文字，通篇依次叙说其“伏闲隐奥”的性情，遍览百家的学养及勇于行义的操守。

文人既借记文各抒其志，则记文中关于亭台生活的描述，就超出了唐人几近模式的良辰美景、体和心逸的范围。蒲宗孟在《迂堂记》中将对亭台生活的描述与其志意结合起来：“堂之屋七楹，涂概朴野，宅华栋者笑吾迂其居矣。案有书万卷，早夜驰骋，商财利者笑吾迂其习矣。风来蕉翻，声状万种，酣丝竹者笑吾迂其听矣。竹榻不几，莞簟野屨，事雕美者笑吾迂其用矣。饮水饭蔬，含嗅哺粝，食鲜美者笑吾迂其腹矣。古图名像，环列壁间，拥姬侍者笑吾迂其好矣。与人语未尝不及善，悻悻为恶者笑吾迂其言矣。问讼听政，求合乎经，尚法者笑吾迂其守矣。”¹³⁾“涂概朴野”、伏卷简食是身居斋堂的日常生活，也是刚正守迂，不愿以谄媚悦人的心怀志意。

II

借记亭台牵连国政民生，表白心性修养、学问志意，但这些与宴息之亭台斋堂并无直接关系，林云铭评《喜雨亭记》时云：“亭在官舍，为休息之所，无关民生，髯苏却借雨后大雨，语语为民，便觉阔大。”¹⁴⁾苏轼以雨名亭，实则亭为亭，雨为雨，两无干涉。亭以雨名，是由于“古者有喜，则

13) 全宋文：卷一六三一。p.15.

14) 段干木明校注. 古文笔法百篇. 合肥：黄山书社. 2002. p.17.

以名物，示不忘也”。¹⁵⁾ 作文记亭，也为记及时雨带来的喜悦及作者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即此时亭台并不以其实物引人眼目，而因宋人赋予其中的人文精神凸显价值。

这从此时亭台命名中也可看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及亭台题名时说：“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¹⁶⁾ 按景致而命名，融会主观情致与外在物象，从中最能体现主体面对客体的创作姿态。为园林题额之雅事兴起于唐，当时亭台命名或以景色，或因地名人，多求名副其实。如文彦博在《思凤亭记》中云：“夫考室命名者众矣，或即其地号而著，或因其实事而称，揭而书之，斯用无愧。”¹⁷⁾ 即因亭台之事实命名。至宋则不然，常以义命名。如欧阳修的丰乐亭，醉翁亭，司马光的独乐园，苏轼的超然台等，皆于其中寓含深意，且其意非亭台之意，而为文人胸中之意。苏轼以亭志喜，实可谓之借物寓意。因而此时记文多关注亭台中所附着含义，对亭台实体的建造过程则多忽略不计。亭台中所寓之意就成为记文要着重表现的内容。

宋亭台记的基本体式是文章常围绕题名展开，其中叙事、写景、议论皆以实现主题为目的，文章布局安排、跌宕腾挪皆不脱此。如《寄老庵记》以寄老为线，首论贤者当“量已而受任”，“畏满而知止”。其次记孙莘老择山水之地以筑庵，后论惟知者能乐山水之美，莘老寄老于山林泉石，全篇围绕“寄老”之意或议论，或叙事。《超然台记》前发超然之意，后叙事，写景。唐顺之称之为“解意兼叙事格”。开篇议论，认为能超然物外，则无往而不乐。后述移守胶西，筑台以游，皆以乐字贯穿首尾，于日常生活中陶然自乐，正合超然之意，姜宝云：“此记有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脱出尘寰之外之意，故名之为超然。”¹⁸⁾ 虽于作文之时忽而叙事、忽而议论，但其中意脉则一以贯之，欧阳修的亭台记文最能体现这一特征。

15) 全宋文：卷一九六七。p.861.

16)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p.137.

17) 全宋文：卷六五八。p.56.

18) 吴孟夏，蒋立甫主编. 古文辞类纂评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p.1768.

欧阳修文向以纤余曲折胜，朱熹评云：“六一文有断续不接处，如少了字模样……然有纤余曲折，辞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辞意一直者比。”¹⁹⁾ 这一特征在亭台记亦有鲜明体现，文章在行文照应、语意联结等方面时常逸出常格，但各组成部分又皆能虚笼于题名范围之内。如《夷陵县至喜堂记》，前段记夷陵风俗俭陋，后段有言仕宦得善地。唐顺之称之为“前后不用照应”格。但细览全篇，命意不脱“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一句。即为题名之意，又是行文布局的线索。首段记夷陵风俗不美，即为始来而不乐之由。中间插叙朱君能变陋俗以致归美，使得夷陵虽“风俗朴野”，但“少盗争”，且江山秀美，能使仕宦者“既至而后喜”。就作者个人来说，虽贬至偏远之地，但能得朱君优待，也可谓“既至而后喜”。《画舫斋记》则先描述斋的构造建制和周围风物，“深七室”、“阑槛其两旁”、“佳花美木之植列于两檐之外”，使得斋堂看似小舟泛乎中流，接着以《周易》中舟为“济险难”之物，引出向时乘舟履险的经历，末段云“苟非冒利于险，有罪而不得已”则可享舟行之乐，以说明斋取“画舫”为名的原由。行文皆围绕“舟”字徐徐展开。《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昼锦堂记》等皆然。

苏轼的《喜雨亭记》体式亦与此同。文章开篇破题，说明亭以雨名，是为志喜。以下就围绕“喜雨”与“亭”展开论述。先交代喜雨之后，亭始建成。继言无雨则不能乐此亭，末以雨力层层推原，归结于亭。则“不但舍雨之外无以名此亭，亦舍亭之外无以名此雨”。²⁰⁾ “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²¹⁾

文章议论、叙事、写景皆为阐发文人赋予亭台之“义”，此“义”形成文章的主题，与题名或重合，或相关，如柳开《来贤亭记》之“来贤”，范仲淹《清白堂记》之“清白”，张俞《素履亭记》之“素履”，题名即为主题，或于题名之外重新立意，如尹洙《襄州岷山亭记》论仁政，欧阳修《岷山亭记》论喜名，但皆由岷山羊杜典故生发。这种阐发且展开的文章体式更接近于

19)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9。p.3306.

20) 古文笔法百篇。p.17.

21) 古文观止。p.363.

论说,正如陈后山所云:“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²²⁾ 以论为记是陈对宋记体文的体认,具体到亭台记,我们可看出,以论为记并不单纯是记文中议论成分的增加,而根本地在于一种文体意识。

宋亭台记文即使仅为叙事,也暗寓着作者的某种志意或哲思。如上文分析的《画舫斋记》,前记乘舟履险的经历,特意提及“当其恐时,顾视前后,凡舟之人非为商贾则必仕宦,因窃自叹,以谓非冒利与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后言舟行之乐,则强调“苟非冒利于险,有罪而不得已,使顺风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则舟之行岂不乐哉!”²³⁾ 则是安乐之时对履险经历的回顾和总结,这里作者没有耽于侥幸脱险的情绪发泄,而是智性地将履险归结于人自身的行为——冒利与不得已。“欧公文字宛转,以见出险而不忘险之意,且言前日之险,亦仕宦自取之尔。”²⁴⁾ 此外《丰乐亭记》、《喜雨亭记》等皆然,这种在叙事中表现思想观点的作法,唐顺之称之为以叙事行议论。以议论为记是宋亭台记的鲜明特征,这其中也深刻地体现着宋人在面对客观外物时迥异于唐人的姿态:物不以其本体,而因附着主体精神的意义而存在。

III

宋代“以论为记”的亭台记文仍由记事、写景、议论三种要素组成,但较之唐代,各部的组合及比重皆有所变化。在写作体式上表现出如下的特征:

一、最能体现宋亭台记文特征的体式是先议论,后叙事,叙事紧扣议论,如尹洙《襄州岷山亭记》前借羊公事迹,论“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无穷已也。”后记燕公来襄阳,修岷山旧亭,后继之以颂,以议论出之,

22) 稗编:卷七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全宋文:卷七三九。p.102.

24) 古文集成: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认为虽羊公声名之不朽以其仁，不以其迹，但修亭可“徇其民之思”，且“未有爱其迹而不思其人者也”，以思慕羊公推断燕公之政亦为仁。紧扣前半仁政之论。欧阳修《岷山亭记》体式亦然，前议论，后叙事，尹洙记文重在论羊公之仁，借以提升燕公之政。欧文则重心在后，借羊、杜二子以讽史君。前半议论皆围绕“名”字。岷山因羊祜、杜预而名著。元凯以其功，而叔子因其仁而名垂不朽，文章到此与其他同题文字无异，但下面紧接一转语：“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既引出对羊、杜“自喜其名之甚”，“过为无穷虑”的批驳，又意谓有实则有名，不待孜孜以求。下半闲闲叙事，对史君的行为无多评判，但比照前文，则其中褒贬讽颂判然立见。“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为后“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伏笔。“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为后“其为人与志之所存”伏脉。前后贯通，脉络相生。文章妙在如孙琮所云：“写上半篇，处处呼动史君，写下半篇，处处回绕二子，真如绮锦毂文，细细回环。”²⁵⁾亭台记中对亭台生活的描述，虽以纯叙事的方式说出，但作为议论的例证，也极富理趣，表现出宋人理性反省的生活态度。

这类亭台记虽仍以议论、写景、叙事为内容，不脱风物、政绩、宴乐等元素，但比之唐人，文章结构则显圆活纯熟。如林云铭评《醉翁亭记》：“亭在滁州西南两峰之间、酿泉之上，自当从滁州说起，层层入题；其作亭之故，亦因彼地有山水佳胜，记虽为亭而作，亦当细写山水；既写山水，自不得不记游宴之乐；此皆作文不易之定体也。”“但其中点染穿插，布置呼应，各极自然之妙，非人所及。”²⁶⁾将叙事、议论、写景灵活穿插、融合并用，叙事部分杂以议论较为常见，此外亦有在景物描写中穿插议论的，如梅尧臣《览翠亭记》：“夫临高远视，心意之快也；晴澄雨昏，峰岭之态也。心意快而笑歌发，峰岭明而气象归。其近则草树之烟绵，溪水之澄鲜。衔鳞翻来，的的有光；埽黛侍侧，妩妩发秀。有趣若此，乐亦由人。何则？景虽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计其事简，计其善决；乐不计其得时，计其

25) 欧阳修资料汇编。p.713.

26) 欧阳修资料汇编。p.820.

善适。能处是而览者，岂不暇不适者哉？吾不信也。”²⁷⁾ 在摹景绘物时，说明“乐亦由人”、“乐不计其得时，计其善适”的道理。

记文既以表作者胸中之“义”为目的，布局安排也以此为准则的。唐人面面俱到的做法被丢弃，代之以文章布局的有意识的增减，欧阳修《岷山亭记》意在规箴史君之好名，因此叙事部分侧重记襄人乐其政而欲记石传远，对亭台的兴废及风物等与主题无关的部分简笔略过，在篇末云：“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究其详者，皆不复道。”²⁸⁾ 写景、记事都因其无关主题被省略掉。

二、以议论为主。这类亭台记以议论为主体发明亭名之义。通常体式是：将与亭台修造等相关的内容以小序的形式叙出，在正文部分议论，如欧阳修的《有美堂记》、王安石《石门亭记》及曾巩的《清心亭记》、《饮归亭记》、苏轼《醉白堂记》等皆然。欧阳修在《与梅圣俞》的书信中有：“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²⁹⁾ 这里说的便是《有美堂记》，欧阳修提倡古文切于实用，认为“述游览景物，非要务”，且未亲历其处。记文将笔墨集中于发明“有美”之义。不记亭台风物，论及其人则以“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一语带过。此时尚为一种权变的文章写法。至王安石、曾巩、苏轼作记时已将之作为亭台记文基本的写作体式，记事部分只简单地交代请托之人、亭之命名等，以接入正文的议论。如《石门亭记》在首段的简短记事之后有：“君至而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书与其甥之婿王某，使记其作亭之意。”³⁰⁾ 《清心亭记》也有：“嘉佑六年，尚书虞部员外郎梅君为徐之萧县，改作其治所之东亭，以为燕息之所，而名

27) 全宋文：卷五九三。p.521.

28) 全宋文：卷七四零。p.121.

29) 全宋文：卷七一零。p.292.

30) 全宋文：卷一四零八。p.54.

之曰清心之亭……至冬乃为之记曰：”³¹⁾ 可见作亭、名亭之意代替亭台修造风物成为此类亭台记的作文目的。且在正文的议论前以“记曰”引入，则完全突破了记为记事之文的文体意识。

三、宋亭台记还吸收了其它体裁的表现方式，对记文的写作手法做了有益的开拓和尝试。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赋为文，及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对话说时景之传奇体，前人已多有论述，此不赘言。本文拟对问答体作一扼要论述。宋亭台记中较多地应用了问答体式，蔡襄《杭州消暑堂记》以诘难的形式叙述出堂的清爽怡人，在答问中阐明游观有助政事的道理。司马光《仁瞻堂记》在一来一往问答中，讲明筑堂之由，作记之因，潞文公的功德政绩。朱长文《贤行斋记》设问答以述林德祖之性义。刘敞《待月亭记》以宾主之词引出亭名之由，建亭之旨。以主人之口道出亭之风物、建制，以客规箴的口吻道出于亭中礼宾友，求仁义。内容与他文无异，仅由不同人口中叙出。张俞《恤民亭记》以对话的形式论建亭之义，在辩难中，凸显黄士安尚义方正的品质，层层深入地揭示主题。苏轼《喜雨亭记》、《众妙堂记》中间答的使用更为灵活，前者以短促的问答表现望雨之勤，忧旱之苦。后者则记梦境中众人的对话以阐“众妙”之义，且辅以动作，直似一情境短文，颇具趣味。

IV

相比较唐代，宋亭台记既以记亭台所赋之义为务，其主体意识增强则为题中应有之义，唐时记亭台之人，通常是僚属，宾客，也有上级为下级作记，如颜真卿《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记邑宰李清重修水亭之事，元结为县大夫瞿令问作《寒亭记》，但较少见。宋代则多请名人或亲友作记，如滕宗谅在《求记书》中说：“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

31) 全宋文：卷一二六二。p.508.

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³²⁾亭台楼阁等木石建筑，总敌不过岁月流转，但一篇脍炙人口的记文则能使亭台声名雀起，流芳千古。岳阳楼、滕王阁等在历代的起弊兴废皆与其中附着的文化意味密切相关。李贽《连山燕喜亭后记》：“余自幼伏览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记》，则知连州山水之殊。亭之称，因记为天下所嘉。”³³⁾即使亭已废毁，而记文及依记所作之图仍能广为流播。

宋人则有意识地利用名人记文增亭台之辉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集中皆有受人反复请托而不得辞的记文。作记之人身份的改变，影响于此时亭台记文的是主体意识大大增强，作者不再单纯地处于叙述者的位置，而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所记之事加以评断。脱离了应用性带来的种种规制，写作时显得更为灵动。

首先是对亭主人的称颂，不再局限于政德吏能，而扩展到学问品行、心性修养等方面。并且由于平等的审视视角，品评人物更加真实贴切，虽仍不免应酬推举，但至少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陈词套话。至如欧阳修在《昼锦堂记》中对韩琦的品断，被《宋史》采纳，更可作为此类文章的典范。《曲洧旧闻》中云“欧公作昼锦堂记，成以示晁美叔，秘监云，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如此，予所亲见故实，记其事无一字溢美于时也，他人皆惴栗流汗不能措一词，公独闲暇如安平无事，真不可及也。”“欧阳永叔作昼锦堂记，曰：“临大节，处大事，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天下传之，以为知言。”³⁴⁾文中如此精当地品评人物，除表现出欧公的雅鉴精识，也反映当时亭台记文体意识的迁变。

其次是亭台记中颂扬意味减弱，而暗寓规箴和劝戒。这一特征在唐元结、柳宗元笔下已初露端倪，宋亭台记则将之发扬光大。元结在《茅阁记》的末尾云：“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热，谁似茅阁，荫而麻之？於戏！贤人

32) 全宋文：卷三九六。p.167.

33) 董诰. 全唐文：卷七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p.7912下

34) 朱弁. 曲洧旧闻：卷八，丛书集成本。p.63.

君子为苍生之麻荫，不如是邪？”³⁵⁾ 以茅阁荫人比贤人君子为苍生之麻荫，似颂似讽。柳宗元《韦使君新堂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屋漏，以为二千石楷法。”³⁶⁾ 前言亭台修造中表现出韦公欲因俗成化、除残佑仁、废贪立廉，言下不免牵强，后则将之归结为二千石楷法。看似颂扬，实为讽诫。这种有讽有颂的主体情态在宋文中更为普遍，如前文已提及的《岷山亭记》，从前后议论与叙事的相互照应下，即可看出欧公对史君的态度是颂中有讽，正如何焯所云“言外有规史君好名意，盖叔子是宾，光禄堂却是主也。史君非其人而尤汲汲于名，公盖心非之，妙在微讽中有引而进之之意，仍归于敦厚也。”³⁷⁾ 但文章中的“引而进之之意”并不都能从文本中获悉，范公偁的《过庭泉》：“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貽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³⁸⁾ 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四《逐客》篇云：“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已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³⁹⁾ 正可印证上文滕子京谪巴陵愤郁不平的说法，说明记文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为讽喻，而非颂赞。

受请托而作的记文，其中存在两个言说者：亭主人和作者，作亭者欲

35) 全唐文：卷三八二。p.3875下

36) 全唐文：卷五八零。p.5863下

37) 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范公偁撰，孔凡礼点校《过庭泉》，北京：中华书局，2002。p.324。

39) 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p.138。

光大作亭之意，作记者或叙述，或评论。在唐亭台记中，这两种言说是重合的，作记者或单纯叙述，或附和作亭者的意图。宋人则不然，在为人作记时常常要发独立的见解和言说，使读者时刻感受到另一种声音的存在。苏轼的记文可为鲜明的例证。他在凤翔府任制科签书判官时，为太守陈公作《凌虚台记》，其中有：“东则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则汉武长杨五柞，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计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数世之后，欲求其髣髴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⁴⁰⁾ 作记本为传远，苏轼却认为外物兴废起灭，皆不足恃。《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陈希亮字公弼，天资刚正人也。嘉佑中，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故东坡《客次假寐》诗：‘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又《九日独不预府宴登真兴寺阁》诗：‘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其不堪如此。……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曰：‘东则秦穆公祈年橐泉，……。’公弼览之，笑曰：‘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⁴¹⁾ 认为苏轼因不满陈公而作此记。这项记载颇具历史的生动性，但近于小说家言，代恚则持论正大，他认为“盖其胸中实有旷观达识，故以至理出为高文。若认作一篇讥太守文字，恐非当日作记本旨。”⁴²⁾ 这种不顾及亭台主人的意图而发旷识宏论的做法，不仅见于此篇。

熙宁五年，孙觉守郡，作亭于府第之内，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陈列，请苏轼作记。苏轼为之作《墨妙亭记》，在记事之后，论曰：“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犹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

40) 全宋文：卷一九六七。p.863.

41) 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p.121.

42) 古文观止。p.364.

坏。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将深檐大屋以锢留之，推是意也，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⁴³⁾ 后论“知命”之意为“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但已与陈列金石无太大关系，“是亭之作否，无足争者，而其理则不可以不辨。”不仅不赞同亭主人的做法，甚至抛开眼前，尽兴发抒胸中宏论。《宝绘堂记》亦然，都尉王君晋卿作宝绘堂以蓄其所有书画，苏轼在记中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⁴⁴⁾ 建安章质夫，筑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苏轼作《思堂记》则论思之不能，不必及不思之乐。

王安石受通判抚州施侯请托，为其所造见山阁作记。文中记叙的修阁原由，黄震颇不以为然，他在《黄氏日抄》中说“谓富工豪贾往往能广宫室，吏亦当因其余力以自娱乐，于理已短，又贬召伯甘棠之事为非，尤未安。”⁴⁵⁾ 后人尚认为此论于理未安，以节义持身的王安石当必不认同此论，但因“数辞不得止”，“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勉强作记。作者在文中设置了另一个言说者：通判与客，借二人的对话说出修阁之意与命名之由，且文中时时强调自身叙述者的身份，欲明示与文中言论的疏离。

宋亭台记主体精神的发扬除以平等的姿态评断人事，还表现在内心情意的真切流露。如欧阳修在为李公佐东园亭作记时流露出的宛转心绪，欧阳修幼年丧父，母郑氏携其往依叔父，安家于随，童年时曾在李家与诸儿嬉戏。文章末段记故地重游：“予亦壮，不夏至其家。已而去客汉沔，游京师。久而乃归，夏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寻童子时所见，则树之蘖者抱，昔之抱者蘖，草之茁者丛，菱之甲者今果矣。问其游儿，则有子，如予童子之岁矣。相与逆数昔时，则于今七闰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叹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夏几闰，幸而再至，则东园之物又几变也。计亭之梁木其蠹，瓦甃其溜，石物其泐乎！随虽陋，非

43) 全宋文：卷一九六七。p.867.

44) 全宋文：卷一九六七。p.870.

45) 黄震. 黄氏日抄：卷六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⁴⁶⁾ 流年似水，再回身已是物换星移，白云苍狗。在记文中自然地感怀伤事，这在唐文中是很难见到的。

历来人们认为宋亭台记区别于唐最明显的特征是以论为记，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文体意识的转变不仅表现为议论的比重增多，更在于作记者以亭台之义来统摄、安排记文的布局结构。在这种转变的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宋人异于前人的观物视角：关注点不在客观事物本身，而在于主体赋予其中的精神意绪，主体精神得到重视。主体精神的张扬和肯定使得亭台记文脱离了应用的性质，真正具有了文学的审美的特性。

<参考文献>

- 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
 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御选唐宋文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成都：巴蜀书社) 1988。
 段干木明校注，《古文笔法百篇》，(合肥：黄山书社)，200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吴孟夏，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 1999。
 《稗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古文集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
 朱弁，《曲洧旧闻》，丛书集成本。
 何焯，《义门读书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范公偁，孔凡礼点校，《过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

46) 全宋文：卷七四一。p.129.

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黄震，《黄氏日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Abstract>

People think that the method of disputation is the most distinct difference of Tingtai Travels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Song, this text argues the change of style consciousness lies in the useness of writing skill of endowing pavilions and terraces with significance, aerato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pavilions and terraces than practicality, and arrangement of article intended to illuminate the significance, we can find a special view that Things catch peoples attention only because of the spirit adhered by person, The spirit that makes Tingtai Travels in Sung dynasty escape from an applied property.

주제어 : Tingtai travels in Sung dynast ; The writing skill of endowing things with significance ; Stylistic feature ; Cultural meaning